

欧洲观察

2015 年第 8 期·总第 123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5 年 8 月 1 日

学术交流

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

郑春荣

内容提要：随着在危机背景下，德国在欧盟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欧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德两国合作的日益紧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凸显出了某种领导角色。本文在分析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变化及其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并运用领导力的三分维度分析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领导角色的路径及其局限性。其后，文章指出了西方对德国会利用其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而牺牲西方共同战略利益的质疑以及德国对此的反应。最后，本文尝试提出我国应对德国在中欧关系中角色的若干思考。

关键词：德国 中德关系 中德“特殊关系” 中欧关系 领导力

中欧关系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对于中德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中德两国在 2014 年 3 月在柏林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促进”¹。

尽管中德双方对两个层面的关系的官方定位很明确，但事实上，随着在金融与经济危机以及其后的欧债危机背景下，德国在欧盟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欧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德两国合作的日益紧密，尤其是西方学界对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²表示出了担心、甚至

* 本文发表在《欧洲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14 页。作者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外交政策新动向及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BG009）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前中德关系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究”（课题批准号：2013BGJ004）的相关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阅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¹ “中德关于建立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国新闻网，2014 年 3 月 29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29/6007673.shtml>,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² 对于欧盟成员国在中欧关系中角色的分析，可参见：John Fox and Franç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ECFR Policy Report*, 2009; François Godement,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Alice Richard, “The Scramble for Europe”, *ECFR Policy Brief*, No. 37, July 2011; 另请参见：陈志敏、彭重周：“比较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一项初步的尝试”，《欧洲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6-35 页。

提出了质疑。在中德两国 2011 年 6 月举行首轮政府磋商前夕，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率先抛出了中德之间正在形成某种“特殊关系”的论调³，对此，国内外也有学者提出“通往布鲁塞尔之路（必须）经过柏林”⁴的说法与之相呼应。但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德“特殊关系”的说法“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难有可能，且有负面作用”⁵。除此之外，针对近年来中德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的事实，有学者表示，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均是中欧关系的领跑者⁶，或者认为德国对华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⁷。

鉴于以上不同观点，有必要深入讨论的是中德关系或者说德国在中欧关系中是否以及扮演着怎样的领导角色？我国又应如何应对这一角色？为了判断德国可能扮演的领导角色，需要解析德国的领导力（leadership）。对于领导力，学术界有各种分类，其中，格鲁布（Michael Grubb）和古普塔（Joyeeta Gupta）把领导力分为结构型、工具型和方向型三种。具体而言，他们把基于政治与经济实力，运用“胡萝卜和大棒”等刺激手段施展的领导力称为“结构型领导力”（structural leadership）；把运用外交技巧建立“获胜联盟”的领导力称作“工具型领导力”（instrumental leadership）。另外，“方向型领导力”（directional leadership）是指通过运用理念或本国示范，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的感受以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的能力⁸。这些不同的领导力虽然有着显著区别，但想要真正发挥影响，德国需要所有这些领导力。

本文将首先阐述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变化，其后分析德国角色凸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领导力是如何施展的，其后论述西方对德国领导角色的质疑以及德国的反应，最后，本文尝试就我国如何应对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提出若干思考。

一 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变化

³ Hans Kundnani and Jonas Parello-Plesner, “China and Germany: Why the emerging special relationship matters for Europe”, *ECFR Policy Brief*, No. 55, May 2012. 事实上，中德“特殊关系”这一概念也曾被德国政府官员借用。在默克尔 2012 年 8 月访华前的记者会上，德国政府官员就曾称中德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参见：“中德‘特殊关系’引热议”，《环球时报》2012 年 8 月 3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31/c_123656392_2.htm,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⁴ Nele Noesselt, “Strategiewechsel in der chinesischen Europapolitik: Umweg über Deutschland?”, *GIGA Focus*, 2011 Number 6; 王义桅：“通往布鲁塞尔之路经过柏林”，《环球时报》2012 年 9 月 1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9/3089829.html>,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⁵ 梅兆荣：“关于德国和中德关系值得商榷和应当正确看待的五个问题”，《世界发展研究报告系列》2014 年第 3 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

⁶ 周弘：“盘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2003-2013）”，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27 页，这里第 14-15 页。

⁷ Sebastian Heilmann, “Deutsche Chinapolitik in Europa führend”, *Review* 2014, <http://www.review2014.de/>,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⁸ 两位作者是在分析欧盟在全球气候变迁议题上的领导力时进行这样分类的，本文在这里加以借用。参见 Michael Grubb and Joyeeta Gupta, “Leadership.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Joyeeta Gupta and Michael Grubb eds., *Climate Change and European Leadership: A Sustainable Role for Europ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p. 15-24, here p. 23.

相对于法英等欧洲大国,中德建交相对较晚。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后不久,中国与欧盟的前身、即欧洲共同体也于1975年建立了官方关系。建交以来,中德关系虽然经历过曲折与摩擦,但总体呈现出平稳发展的态势。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科尔政府于1993年在欧盟国家中率先制定了亚洲战略,其中包含的对华政策三原则⁹也对其后不久欧盟通过的新亚洲战略和对华长期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¹⁰。不过,在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方面,中法战略伙伴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特殊地位,在经历了中法关系的去特殊化之后¹¹,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又成为了主旋律¹²。在这期间,中德双方虽然依然在继续扩大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但中德关系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

2007年9月,默克尔总理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一改前任政府的务实外交,推行“价值观外交”,在总理府会见达赖,使得中德双边关系跌入1996年以来的最低谷。但是,2008年10月,随着默克尔访华,中德关系相较于中欧关系率先走出低谷,并获得了加速发展¹³。从此以后,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从作为欧盟大国之一在中欧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转变为了某种领导角色。正如本文引言所述,至少中外学者们或多或少持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在官方表态中,对德国在中欧关系中角色的认知也趋向于更为积极,例如,我国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访欧时就曾表示,“法国、德国是欧盟的领头羊,也是对华关系引领者”¹⁴。

在中欧关系的实践中,德国的领导角色也日益凸显出来。我们这里可以参考“欧洲外交政策打分表”的评价。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从2011年起发布欧洲外交政策打分表,迄今已经发布了5份¹⁵。打分表除了评价欧盟机构的表现,从2012年起也评价欧盟各成员国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双边外交,其中包含有欧盟各成员国在涉华议题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

⁹ 这三原则是:1. 避免公开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2. 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3. 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参见: Deutscher Bundestag, *Unterrichtung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 Asienkonzept der Bundesregierung*, Drucksache 12/6151, 25.10.1993. 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外交部于2002年提出了新亚洲战略,在强调经贸合作外,突出了德国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参见: Auswärtiges Amt, *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Ostasien*, Berlin, 05.2002.

¹⁰ 刘丽荣:“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德国研究》2013年第3期,第45-57页。

¹¹ 张骥:“去特殊化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98-117页。

¹² 关于中欧关系过去10年多的盘点,参见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¹³ 关于中德关系的概览,参见顾俊礼主编、杨解朴副主编:《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杨解朴:“中德关系:中欧关系的领跑者”,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9-188页。

¹⁴ “铺设友谊、理解、合作的桥梁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荷兰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新华网,2014年4月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2/c_1110067100.htm,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¹⁵ ECFR,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Scorecard”, <http://www.ecfr.eu/scorecard/>,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分类。对此，打分表按具体政策领域把每个成员国分为领导者(leader)、逃避者(slacker)和支持者(supporter)，其中，领导者和逃避者代表该成员国在欧盟外交中扮演着特别积极或特别消极的角色，而支持者则意味着表现并不突出。

2012年的打分表在涉华议题上选择了四个项目进行成员国分类，这四个项目是：“中欧对话机制、中国和欧洲公共采购市场准入上的互惠性、与中国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上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在气候变迁议题上的关系”。其中，在气候变迁议题项目上，德国与法国等另外7个欧盟国家被列为领导者，这主要是指在德班气候大会上，欧盟重夺谈判主导权，成功促使中国和其他排放大国接受在2020年前签订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2013年的打分表选择的四个项目是：“加强欧洲与中国的战略对话、增加对中国在欧投资的审查、在反倾销议题（如光伏）上采取更强硬立场以及促进中国的人权”，德国在促进中国人权的项目上被与捷克、瑞典列为领导者，这主要是因为它在与中国的双边对话中，在人权问题上提高了嗓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倾销议题上，德国与英国被列为逃避者，德国之所以上榜是因为德国反对欧盟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详见本文第三章）；2014年的打分表选择了五个涉华项目，它们是：“利用高级别联系机制以增强欧洲对华战略方案、双边对话中的亚洲安全议题、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支持欧盟展开反倾销调查的强硬立场）、支持欧盟在光伏案上的强硬立场以及支持欧盟在西藏、法治和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出于与前述相同的原因，英国和德国分别被列为“支持欧盟展开反倾销调查的强硬立场”和“支持欧盟在光伏案上的强硬立场”项目上的逃避者；2015年的打分表把“亚洲和中国”列在了一起，其中进行国别分类的栏目有：“协调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增强在印度的投资以及与印度的关系、大声指出违反人权情况或就此采取行动、就海洋冲突与亚洲国家协作以及形成对中国投资行动的欧盟共同立场”，其中，德国在协调欧盟对中国的立场上，和芬兰、波兰共同扮演领导者角色¹⁶。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打分表对成员国的角色只是选择了个别议题领域进行分类，并不全面，而且，它有着鲜明的主观倾向性，例如把德国在中欧光伏争端中反对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立场视为逃避责任，虽然德国的立场在中方看来恰恰是解决贸易冲突的建设性立场。尽管欧洲外交政策打分表有着诸多说服力上的局限性，但它至少可以表明，一方面德国在中欧关系的一些议题领域担当着领导角色，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德国并非在所有议题领域都是领导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打分表还表明，在德国担任领导的领域里，德国也并非孤独的领导者，而是有其他欧盟伙伴共享领导权。值得一提的是，在迄今所有涉及项目的成员国分类上，被赋予领导角色最多的是法国和德国。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德国在中欧关系中扮演着有限领导的角色；如果这种有限地领导是德国主动为之，那么也可以认为，德国是有选择地在发挥领导力。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也认为，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

¹⁶ 德国在欧洲外交政策打分表上的总体评分持续上升，在2015年，在所有52项议题中，德国在17项上被列为领导者，且没有在任何项目上被列为逃避者；其他获评领导者项目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瑞典（11项）、英国（11项）、法国（8项）。

领导角色并未覆盖所有议题领域，这是适盘外交（Niche Diplomacy）¹⁷的体现：“适盘外交”旨在确定双边关系中规模尚小、但有扩建能力的行动空间，它的一个优势在于能避免实质上不同的行动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经济关系不会因价值标准上的分歧而受到拖累，由此可提高德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和调适能力¹⁸。

二 德国在中欧关系中角色变化的原因

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领导角色凸显既有德国内部的因素，如德国在欧盟内地位的提升及其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有我国将外交重点从欧盟层面转到成员国层面等外部因素，但金融与经济危机以及其后的欧债危机无疑可以被视为“时机之窗”，它成为了中德加强合作的催化剂，而中德合作的扩大和深入又反过来使得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进一步凸显。

（一）德国在欧盟内地位的提升及其外交政策的调整

一方面，在危机背景下，德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在欧盟内“一枝独秀”，德国不仅在欧盟的经济实力日益突出，而且成为欧盟内应对欧债危机的领导力量。伴随着法国的衰弱，原先的法德轴心也朝着德法轴心乃至德国单独领导的方向发展。

不过，德国一直遭到诟病的是，它无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不愿意将它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德国基于其历史经验，怀有“逃避领导的条件反射”（leadership avoidance reflex）¹⁹。

但是，在2013年底新一届大联合政府上台后，情况有所改变。新政府表现出了意欲推行积极有为外交政策的新动向²⁰，日益呈现出“结构型领导力”。在2014年1月底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统高克、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之间相互配合的“三重奏”，呼唤德国拿出领导力²¹。到了1年后的第5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德国已经做好了担任领导角色的准备。为此，她还提出了“从中心领导”（Leadership from the Centre）的概念，按她的说法，这是指把某个行为体的最佳资源与能力投入联盟或伙伴关系中，而德国比其他任何成员国都更适合担当此角色²²。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在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

¹⁷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7.

¹⁸ Sebastian Heilmann, “Lob der Nischenpolitik. Deutschland spielt in Europas China-Politik heute die Rolle des Impulsgebers”,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vember/Dezember 2014; see also Sebastian Heilmann, “Niche Diplomacy at Work: Germany’s Catalytic Role in European-Chinese Relations”, *Strategy Essay China Monitor*, Number 21, 28 November 2014.

¹⁹ Williams E. Paterson, “Germany and Europe”, in Stephen Padgett, Williams E. Paterson and Gordon Smith eds., *Development in German Politics 3*,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06-226, here p. 211.

²⁰ 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4页。

²¹ 相关演讲报告参见：

<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activities/munich-security-conference/msc-2014/speeches/>,

<http://www.ecfr.eu/scorecard/>,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²² Speech by the Federal Minister of Defence, Dr. Ursula von der Leyen at the 51s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威海路233号803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mail@sies-cn.org

中也表示,德国致力于成为欧洲的“首席推进官”(Chief Facilitating Officer),意欲作为“负责任的捐客”锻造统一的欧洲立场²³。由此可见,德国已经越发敢于承担起欧盟内的领导角色,这对于德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更积极角色有着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危机以来,德国也在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这是欧盟内的普遍现象。尽管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旨在使欧盟的对外行动更具一致性,但现实中呈现的却是欧盟外交政策“再国家化”的现象。所谓“再国家化”,是指欧盟各成员国、尤其是欧盟内的大国出于本国利益重又选择自行其是,而不是谋求达成欧盟的共同立场。2011年3月,德国就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投弃权票,不与其西方盟友保持共同立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²⁴。

与欧盟外交“再国家化”相伴而生的“外溢效应”是,欧盟各成员国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更加重视与新兴大国发展关系,对其推行的政策也更为务实,往往把追求经贸利益作为当前政策的主要目标²⁵。德国也相应展现出自己的“方向型领导力”,例如,德国正是在2010年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和政府磋商机制²⁶。而且,德国这期间先后发表了多份与全球新兴地区和大国发展关系的文件,特别是德国政府在2012年出台了题为《塑造全球化、建立伙伴关系、分担责任》的文件,其中,德国政府表示要作为平等伙伴,与“新的建构力量”(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加强合作²⁷。由于这份文件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招致德国国内反对党的批评,它们指责这份文件“过于以经济标准为导向”,更多的是一份“对外经济计划”²⁸。

(二) 中国对欧战略的调整

2003年,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但自2005年起,欧盟出于对中国相对实力地位增长的担忧,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中欧关系遂进入“调整期”。与此前阶段相比,欧盟更加强调中国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²⁹。与此同时,在危机背景下,欧盟变相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强调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例如,在对华关系中,2010年9月的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明确把加强商品和服务业

Munich, February 6, 2015.

²³ Frank-Walter Steinmeier, “Maintaining Transatlantic Unity in a Complex World”,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Washington, DC, 12 March, 2015,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15/150312-BM_CSIS.html,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²⁴ 郑春荣:“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14页。

²⁵ 欧洲所课题组:“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外交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5-21页。

²⁶ 迄今,中国仅与德国建立了这一机制;对于德国而言,除中国外,它也仅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俄罗斯、以色列和印度等少数国家建立了这一机制。

²⁷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 Verantwortung teilen*, Berlin, 2012.

²⁸ “Neue Partnerschaften mit neuen Gestaltungsmächten”, Außenminister Guido Westerwelle stellte sich den Fragen der Abgeordneten,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7/8600, 08.02.2012.

²⁹ 李靖堃等:“中欧政治关系”,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57页。

威海路233号803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网址: 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 mail@sies-cn.org

的市场准入和改善投资条件、保护知识产权、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严格控制出口补贴等列为欧盟的战略利益³⁰。

中方对中欧关系曾有着很高的期待,但中欧之间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诸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等,都未能得到解决,由此使中方对于在欧盟层面推动双边关系产生了失望情绪。鉴于欧盟在对外行动方面不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体,而且,欧盟方面在利用欧盟与成员国这两个层面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也需要适应欧盟的多层级博弈体系。换言之,欧盟对华政策碎片化的起因并不在于中国的战略意图,而是欧盟各国基于利益分歧在对华政策上相互竞争造成的³¹。加之,金融与经济危机以及其后的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机构的影响力有所削弱,而如上所述,欧盟内主要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地位凸显,更是助推了中国对欧战略重心从欧盟层面向成员国层面的调整³²。

(三) 中德关系的加速发展

如前所述,默克尔上台后,曾一度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使中德关系陷入冰点,但随着危机的爆发,默克尔政府迅速改弦更张,重回务实外交轨道,因为金融与经济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的应对,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同时,德国力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缓解欧债危机对其经济的影响,例如在危机背景下,欧盟内对德国的出口需求大幅下降,而德国与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大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填补了德国在欧盟内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缺口。

如今,中德关系在多个方面领先于欧盟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首先,两国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性和互利合作日益显著。双边贸易额不断创出新高,在中欧贸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如今,德国作为欧盟内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出口已经占欧盟对华出口总额的近一半,而进口已占欧盟从华总进口的四分之一。其次,中德之间建立了60多个政府间经常性对话机制,尤其是中德政府磋商机制引入瞩目,迄今,中德两国之间已经举行了三轮政府磋商,并在2014年3月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两国加强了外交与安全政策问题上的协调,并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2014年10月,中德双方发表包含110条内容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在欧盟国家中率先制定了非常具体的、面向创新的中长期合作计划³³。

但是,正如本文引言中所指出的,恰恰是因为中德之间的日益走近,导致了西方学者抛

³⁰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of European Council of 16 September 2010, EUCO 21/1/10 REV 1, Brussels, 12 October 201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16547.pdf,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³¹ Nele Noesselt, “Gipfeltreffen in Peking: Nationale und globale Dimensionen der sino-europäischen Beziehungen”, *GIGA Focus*, Number 10, 2013.

³² 西方学者对中国对欧战略调整的观察,参见: Nele Noesselt, “Strategiewechsel in der chinesischen Europapolitik: Umweg über Deutschland?”.

³³ “中德发布《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全文)”, 新华网, 2014年10月11日,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10/11/content_33730190.htm,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出了中德“特殊关系”的论调，并日益关注和质疑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详见本文第四章）。

三 德国在中欧关系中角色的发挥及其局限性

我们在本文第一章已经结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欧洲外交政策打分表指出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有限领导角色。一个欧盟成员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盟对外关系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例如，在超国家化的贸易政策领域，欧盟委员会是最重要的执行者，由它来协调各国的利益，欧盟理事会是最终决策者；但是，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还主要适用政府间主义的决策方式³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全体一致表决机制下，大国小国都拥有否决权，但德法英三大国（尤其是德国）在欧盟外交政策中无疑具有远超平均水平的影响力³⁵。

我们以下运用本文开头提出的对领导力的分类法，结合中欧光伏争端这一案例来具体分析德国是如何发挥其角色的。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案例发生在德国在欧盟内的结构型领导力提升背景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看来，德国在这一案例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领导力，而从我国的立场来看情况又似乎相反，因此，从这一案例的分析中，不仅可以看到德国是如何发挥其领导力的，又可以看到德国在发挥领导力上的局限性。

2012年7月开始的中欧光伏争端，是中欧至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欧盟方面始终寄希望于通过光伏案向中方施压，逼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³⁶。由于德国在此次光伏争端中是最主要的利益相关国，尤其是鉴于中德之间紧密的经贸合作，德国不愿意看到中欧之间爆发贸易战，但德国在希冀中国开放市场方面也和欧盟有着同样的诉求。在我国的高层外交斡旋下，最终，德国在欧盟内利用其结构型领导力进行了干预，例如2013年5月14日，德国时任经济部长罗斯勒访问欧盟委员会，提醒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德·古赫特要考虑贸易战的后果。而就在欧盟委员会6月4日决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后的第二天，罗斯勒再次要求欧盟委员会采取措施避免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将尽全力阻止欧盟因此案而引爆中欧贸易战³⁷。如前所述，之所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德国是逃避领导责任，也恰恰是因为德国没有与欧盟委员会的立场保持同步，而是对后者进行了施压。

³⁴ 参见弗兰科·阿尔基里（Franco Algieri）：“关键在于体制：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及其制度化”，【美】沈大伟、【德】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周弘主编：《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6-84页；May-Britt U. Stumbau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Decision-Making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den-Baden: Nomos, 2009.

³⁵ Stefan Lehne, “The Big Three in EU Foreign Policy”, *The Carnegie Papers*, 2012.

³⁶ 关于中欧光伏争端的详细分析，参见陈新：“中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周弘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7-49页。

³⁷ “Merkel zum EU-Handelskrieg mit China: ‘Davon halten wir nichts’”, *EurActiv.de*, 27.05.2013, <http://www.euractiv.de/binnenmarkt-und-wettbewerb/artikel/merkel-zum-handelskrieg-mit-china-davon-halten-wir-nichts-007566>,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德国在欧盟内利用“方向型领导力”，始终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光伏争端³⁸，这也在欧盟内给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效应。与此同时，我国各层面也在与欧盟各成员国积极沟通立场。由此，在2013年5月24日欧盟27个成员国就对华征收反倾销税表态时，有包括德国在内的18个成员国表示反对征税，这当中除了和德国一样主张自由贸易的欧盟大国英国和北欧国家，还有许多在贸易政策上经常摇摆不定的小国。虽然德国利用其“工具型领导力”在初裁决上组建的“获胜联盟”离终止程序尚差一票，但是，有这么多成员国反对征税，也使欧盟委员会认识到，在终裁时，它的制裁提议很可能会因这一“获胜联盟”，而在欧盟理事会被推翻³⁹。由此，中欧光伏争端最后以中欧双方达成价格承诺的方式得到妥善解决。

从中欧光伏争端案来看，德国虽然可以利用自己的结构型领导力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影响，但由于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程序的约束，德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实现其希望的结果，例如，尽管有德国的反对和施压，欧盟委员会还是执意决定征收临时性关税。只是在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以及欧盟永久惩罚性关税不可能在欧盟理事会获得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才最终避免了中欧之间爆发贸易战。因此，对于德国而言，如果它想要把自己的政策主张“上载”到欧盟层面，使之变成欧盟的共同立场，就离不开拉拢其他成员国，以组建“获胜联盟”。事实上，中国方面也从中欧光伏争端中吸取了教训，重新认识到，除了主要成员国，欧盟机构也需要给予足够重视，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底访问了欧盟总部，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盟。

四 西方对德国角色的质疑以及德国的应对

欧盟一直希望推行聚合的对华政策，除了定期发布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欧洲理事会也曾出台有关内部安排的文件，以改善欧盟的对外政策，其中提到：需要在欧盟对外行动以及成员国与第三国的双边关系之间形成聚合效应，以便在适当情况下，欧盟层面的行动补充和增强成员国层面的行动，反之亦然。⁴⁰但是，现实是，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各自为政。德国鉴于其在中欧关系中角色的凸显，成为了各方关注和诟病的焦点，有鉴于此，德国也有意作出应对，以避免自己遭到西方伙伴的指责。

（一）西方质疑德国会牺牲其共同战略利益

前文所提及的中德“特殊关系”论者认为，中欧关系的未来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将由迅速发展的中德双边关系所决定，这和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盟内地位的提升紧密相关。他们认为，正因为德国被其外部伙伴（包括中国）感知为欧盟内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这些伙伴调整了它们的对欧战略。他们进一步认为，德国角色的凸显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在

³⁸ “德国总理坚持政治对话解决中欧光伏贸易争端”，新华网，2012年9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17/c_123727192.htm,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³⁹ 郑春荣、夏晓文：“中欧光伏争端中的欧盟与德国：基于三层博弈理论的分析”，《德国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29页。

⁴⁰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of European Council of 16 September 2010, EUCO 21/1/10 REV 1, Annex I, Internal Arrangements. To improve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policy.

于，如果德国能运用其“方向型领导力”，把其对中国的影响力为欧盟共同目标服务，则德国可以在中欧关系中发挥“杠杆作用”。但风险在于，德国利用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实现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非遵循欧洲的战略利益⁴¹。他们表示，德国之所以有诱惑去单独行动，也是因为欧盟其他国家并不能满足德国的利益⁴²。随着中德对话扩大到安全政策领域，虽然这些学者认为中德关系不再局限于经贸议题是好事，但依然担心德国会追求自己在亚洲安全上的方案，而不支持可能会与中国产生对抗的欧洲方案，在最糟糕情况下，德国与中国的双边安全对话会破坏欧盟在这个领域的整体对华战略⁴³。以上对于德国过于接近中国的担忧，也反映在德国的媒体评论中，例如，《法兰克福汇报》载文表示，中国把德国作为欧盟内的领导力量，这虽是“讨人欢喜的，但也是危险的”⁴⁴。

在参与德国外交部于2014年2月启动的“回顾2014——集思外交政策”项目讨论的外部专家意见中⁴⁵，也包含了对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领导角色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在这些观点文章中，有远超一半的文章或多或少提及了德国对华政策和中德关系，由此表明中国在德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西方学者在这些文章中也表示，德国对华政策在中欧关系中（应）扮演引领角色⁴⁶，但是，他们更多地强调，德国鉴于其在欧盟内的经济地位以及日益增长的政治地位，应承担协调欧洲外交政策以及欧盟对华政策的责任⁴⁷。对此，他们指出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在对华政策上，欧盟各国一直有违背欧盟统一政策的单独行动，近年来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有学者认为，在中欧光伏争端中，德国在中国推动下在欧盟内干预，以削弱欧盟共同立场，就是成员国将本国短期的商业利益优先于欧盟长期战略性政治利益的案例⁴⁸。但问题是，欧盟单个成员国（包括德国）的影响力过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欧盟在其对华

⁴¹ Hans Kundnani and Jonas Parello-Plesner, “China and Germany: Why the emerging special relationship matters for Europe”.

⁴² Ulrike Guérot and Mark Leonard, “The new German question: How Europe can get the Germany it needs”, *ECFR Policy Brief*, No. 30, April 2011.

⁴³ Hans Kundnani and Angela Stanzel, “China and Germany talk security”, *ECFR Commentary*, 9th October, 2014.

⁴⁴ David Gordon Smith, “The World from Berlin: China’s View of Germany Is ‘Flattering but Dangerous’”, *Spiegel-Online*, August 31, 2012,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german-commentators-on-merkel-visit-to-china-and-human-rights-issues-a-853205.html>,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⁴⁵ 参见“回顾2014”项目网站：<http://www.review2014.de/en>。日前，德国外交部已经发布了项目总结报告：Auswärtiges Amt, Projektteam “Review 2014 – 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 *Krise-Ordnung-Europa*, Berlin, 2015。本文以下也会参考其他杂志刊发的、与“回顾2014”项目相关的文章。

⁴⁶ Sebastian Heilmann, “Deutsche Chinapolitik in Europa führend”.

⁴⁷ “Denken für Deutschland. Über außenpolitische Versäumnisse, zukünftige Konturen und blinde Flecke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uli/August 2014, pp. 14-23.

⁴⁸ Timothy Garton Ash, “The Federal Republic’s chief challenge: Making the EU work!”, *Review 2014*, <http://www.review2014.de/>,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也请参见：Charles Grant, “Ein Drückeberger: strategisch schwach und merkantilistisch”, *Review 2014*, <http://www.review2014.de/>,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政策上以德国为导向，而不是选择一项共同方案，就会被中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因此，增强欧盟对华政策，这最终对德国也有好处⁴⁹。他们举例说，德国企业抱怨它们在中国遇到市场准入上的限制、不平等对待、知识产权的损害和强制性技术转让，这些问题不是中德双边能够解决的，而是涉及所有欧盟成员国，凭德国一方之力不能促使中国有所改变⁵⁰。此外，他们认为，德国对华关系还必须与美国进行紧密磋商⁵¹。

（二）德国对其在中欧关系中角色保持低调

对于德国（应）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已是中德双方的共识，例如，在李克强总理 2014 年 7 月会见默克尔总理时，我方提出希望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而德方也回应称，愿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⁵²。不过，如前所述，我方还经常将德国（与法国一起）定位为中欧关系、欧盟各国对华关系的引领者。

但是，德国官方至今未作出过如此积极的表示，与此相反，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还特意强调德国不能接受享有特权的角色，例如他在“回顾 2014”项目的总结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抵抗住从德国当前的强势地位中形成的外交政策上的诱惑。如果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但几乎一致提供给德国一个特殊的享有特权的角色，那么，我们……必须始终把它转向欧洲，以避免被过度要求的危险……如果涉及全球化的建构，德国只有在欧洲框架里才有行动能力。德国在国际政治中良好而又具建设性的角色只有在欧洲以及通过欧洲才能实现”⁵³。为此，联邦政府在采取的所有项目上需要系统地且从一开始就一并思考对德国的欧盟伙伴国家可能带来的影响⁵⁴。

另外，德国政府明白，德国想要在欧盟内发挥领导力，不仅需要利用外交技巧，协调欧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立场，在必要情况下，也还受制于美国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德之间过于走近，也会引起美国的警觉和不满⁵⁵。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考验德国领导人的智慧。例如在新近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虽然德国怀有把法兰克福建设成为比肩甚至超过伦敦的欧洲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强烈意愿，且加入亚投行是一个非常好的、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机会，但或许正是因为顾忌美国的疑虑和施压，德国并未在欧盟国家内率先表态，而是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率先表态加入后，才和法国、意大利一起迅速宣布希望加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

⁴⁹ “Denken für Deutschland. Über außenpolitische Versäumnisse, zukünftige Konturen und blinde Flecken”.

⁵⁰ Gudrun Wacker, “Deutsche China-Politik: Doppelte Einbettung gebraucht!”, Blogbeitrag bei Review 2014, Review 2014, <http://www.review2014.de/>,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⁵¹ Sebastian Heilmann, “Deutsche Chinapolitik in Europa führend”.

⁵² “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强调 推进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促进中欧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8 日 03 版。

⁵³ Auswärtiges Amt, Projektteam “Review 2014 – 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 *Krise-Ordnung-Europa*, pp. 11-12.

⁵⁴ Auswärtiges Amt, Projektteam “Review 2014 – 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 *Krise-Ordnung-Europa*, p. 45.

⁵⁵ 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虽然一度德法领导人支持解禁并积极在欧盟内促成此事，但最终迫于美国的施压而无果而终。参见 Vivien Exartie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rench, German and British China Policies. The case of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Saarbrücke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0.

员国的行列。

总之，和如前所述，德国如今已经不再避讳谈论其在欧盟内的领导地位不同，德国对其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始终刻意低调慎言，这和欧盟内其他与中国的关系并未如中德关系那样紧密的国家的高调表态截然不同⁵⁶。但是，在未来，随着德国在欧盟内结构型领导力的进一步提升，德国对于其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的表态是否会有所改变，仍有待观察。

五 结语

在金融与经济危机、尤其是其后的欧债危机背景下，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地位凸显，中国也调整了对欧战略，重心从欧盟层面转向成员国层面，在此期间，中德关系实现了加速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凸显了出来，扮演了某种领导角色。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欧洲外交政策打分表，我们可以认为德国在某些时候、在某些议题领域在中欧关系中的确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德国的领导是有选择性的，并未覆盖全部议题，而且德国一般也不是单独领导，而是和其他欧盟伙伴共同领导。从德国在中欧光伏争端案中领导力的解析之中，也可以看到德国充分施展领导力所面临的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等制约因素。

但无论如何，鉴于德国在中欧关系中领导角色的凸显，我国在通过中德关系促进中欧关系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角色以及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领导角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中国与欧盟打交道的协调成本，但是，面对欧盟多层次、多主体的动态决策体系，单纯倚重单个成员国的领导力，并不能保证我国的外交诉求的实现，近期的中欧光伏争端再次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如果德国在中欧关系中不是扮演积极建设性角色，而是错误运用其“方向型领导力”，发挥负能量，则会反而增加中国对欧盟的协调难度。尽管中德关系目前的发展态势非常好，但这方面的风险是依然存在的。例如，在德国诸多外交政策专家拟订的题为《新权力、新责任：变革中世界里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要素》的咨询文件中，中国依然被定位为一个挑战者⁵⁷。另外，本届德国大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也表示，要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同亚洲国家深化关系，因为德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相同，文件把日本作为“朋友”放在其亚洲政策首位，而中国作为“伙伴”位居第二；《联合执政协议》不仅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竟然还要监督中国践行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强调致力于使中国在宪法中所承诺的权利以及对普遍人权的保障能够得到尊重⁵⁸。如果遵循西方学者的“杠杆作用”的论调，意即

⁵⁶ 例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2013 年 12 月访华时表示，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的最强支持者，而且，尽管欧盟委员会此前有不同立场，但卡梅伦仍表示，他已做好准备，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推动中国与欧盟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参见“卡梅伦访华姿态谦卑惹议 称最强有力支持中国”，《环球时报》2013 年 12 月 3 日，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12/4623561.html,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5.

⁵⁷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pp. 33-36.

⁵⁸ 梅兆荣：“关于德国和中德关系值得商榷和应当正确看待的五个问题”，第 4 页；赵柯：“德国在欧盟的经

德国可以利用其对中国的重要性，而施压中国以实现所谓欧盟的共同战略利益⁵⁹，那么，这对于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发展都将是危险的，需引起我们的警惕。

最后，虽然在学术讨论中（包括本文的分析）可以就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领导角色展开分析，但是，在官方言辞中，应慎用类似的表述，更不应使用中德“特殊关系”的提法⁶⁰，其原因是，这样的公开溢美，只会引起欧盟其他国家、乃至美国对中德两国走近的警惕和猜忌，而且也会使德国在发挥中欧关系的积极促进角色的过程中更为小心和忌惮。

目前中德之间已经将合作扩展到了外交与安全领域，建立了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有助于夯实中德关系的战略基础，也可打消其西方盟友对德国在中德关系上只重经济、不重政治的指责。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德国的西方伙伴仍然会担心或质疑德国将这种扩大的合作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德国需要向其西方伙伴表明，它是出于欧盟的整体利益而为，在这方面，如果德国的行动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与某个（些）欧盟伙伴例如法国的联合行动，则其解释会更有说服力⁶¹。对于中国而言，在谈论和对待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时，也需要兼顾欧盟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重要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在欧盟内确保实现中欧未来合作共赢的“获胜联盟”。

简讯

* 7月18日上午，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阿穆列巴耶夫（Aidar Amrebayev）造访学会，就“中亚与中美丝路战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与伍贻康、李新、汪宁、李立凡、那传林、戴轶尘、丁昕、叶雨茗、杨海峰、及宝莲华新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代表张泽雅等进行座谈交流。

* 7月22日下午，学会召开领导层及党工组联席会议，在总结上半年工作的同时，对下半年“学会学术月活动”及几项重大活动的具体事宜进行商讨，并就希腊问题进行研讨。会长徐明棋、副会长叶江、杨逢珉、郑春荣、秘书长曹子衡、副秘书长戴启秀、杨海峰出席会议。前名誉会长伍贻康也特邀参加。

* 7月23日下午，拉脱维亚议会外委会秘书长斯盖（Sergey Potapkins）访问学会，就一带一路、乌克兰危机、希腊问题与伍贻康、徐明棋、郑春荣、戴启秀、王志强、崔宏伟、李立凡、忻华、曹子衡、叶雨茗、杨海峰、宋卿等座谈交流。

欧洲动态（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31日）

济主导地位：根基和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89-101页，这里第101页。

⁵⁹ Andrew J. Nathan, “Für Werte und Interessen. Warum Deutschland die Menschenrechte in China fördern sollte – und w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ai/Juni 2014, pp. 86-93.

⁶⁰ 梅兆荣：“德国重新崛起之道及其在欧盟及中欧关系中的地位”，《德国研究》2013年第1期，第4-11页；梅兆荣：“关于德国和中德关系值得商榷和应当正确看待的五个问题”，第4页。

⁶¹ 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在《明斯克协议II》的达成过程中，德国默克尔总理就有意拉上法国总统奥朗德，由此减少了欧盟内对俄持强硬立场国家对德国斡旋努力的疑虑。参见郑春荣、朱金锋：“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36-46页。

中欧关系

➤ 欧洲时报网7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舌战希腊债务谈判之际，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访华寻找投资。德媒表示，对于德国经济界而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意义远比希腊更为重要。中德两国15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能源部推动中德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备忘录主要涉及工业生产数字联网，即工业4.0。中德双方还达成共识，将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加强两国政府部门、企业等多个层次的互动，在智能制造以及面向未来的网络化生产方面开展合作。这标志着中德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从概念研讨、分散交流，已上升到战略布局和务实合作的新高度。

➤ 欧洲时报英国版7月22日，中国驻英大使馆经商处公参金旭向媒体通报中英经贸发展情况时表示，回首十年，中英经贸合作成果辉煌；展望未来，中英经贸合作将步入“黄金时代”。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英直接投资存量逾400亿美元，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投资目的地国，逾500家中国企业落户英国。与此同时，英国对华投资也大幅增长，截至2014年底，英对华累计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投资项目超过7000个，是欧盟内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着中英经贸关系不断升温，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与合作，中国企业广泛参与到英国机场、水务、空港城等基础设施建设。统计显示，仅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英投资并购和绿地投资总额就有14亿美元。与十年前相比，对英投资存量已从当初的1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金旭表示，中英经贸关系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示范意义和全球影响。英国率先宣布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客观上为众多西方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英国积极倡导中欧自贸区谈判、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引领中欧经贸合作、促进中西方经贸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 凤凰网7月29日，7月28日，全球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将接受人民币作为银行和经纪商在该平台交易的质押品，这是人民币全球化进程中迈出的最新一步。伦敦金属交易所去年的交易额为15万亿美元，目前该交易所接受的质押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圆。

欧洲政治外交

➤ 环球网7月10日，援引法新社7月9日报道称，法国及德国的内政部长7月9日宣布，会为移民问题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未来两年，法国与德国将会分别接收9100名及1.21万名难民，共占难民总数的1/3，这正与欧盟的期望一致。

➤ 欧洲时报7月29日，德国政府下属的一个独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倾向于创建一个欧元区的国家破产机制，以预防未来的危机，并称相关国家应能够把离开欧元区作为最后的手段。路透社消息，在28日公布的一份特别报告中，由五位专家组成的智库称，希腊债务危机凸现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以提高欧元区稳定性。除了加强欧洲银行业联盟等措施之外，该智库还表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工具还应当辅以一个有序的国家破产机制，这可以保护欧元区互不救援条款具有公信力。

德国

➤ 中新社7月17日，德国议会17日就是否授权默克尔政府参与希腊救助谈判举行表决，最终439票赞成，119票反对，40票弃权，虽然部分反对票来自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默克尔仍顺利获得希腊救助的谈判权。投票前夕，默克尔明确警告议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失控乃至最终退出欧元区，“欧洲不会获得喘息，只会引发意料之中的混乱”，呼吁德国不要不负责任，袖手旁观，“至少要试一试”。

➤ 中国网7月25日，援引德媒报道，现在有超过30万外国大学生在德国大学注册学习。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之后的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数据显示，2014年在德留学生人数为301350，较2013年增加了19000人，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在德高校留学生人数增至350000人的目标得以提前实现。

➤ 环球时报7月28日，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被称为“犹太奥林匹克运动会”第14届欧洲马卡比运动会7月28日首次在德国柏林举行。这个运动会能在曾经排斥和迫害了上百万犹太人的地方举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德国马加比主席阿龙·梅尔说，“这是一场和解运动会。”来自全球38个国家的2300多名犹太运动员竞逐19个项目。28日，运动员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旧址举行纪念活动，然后前往柏林森林剧场参加运动会开幕式。德国总统高克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德国希望，通过举办马卡比运动会，让欧洲的犹太人能够体验柏林丰富的文化生活，各族裔能够共享和平与宽容，共同抵制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

法国

➤ 法国中文网7月14日，7月14日迎来法国传统的国庆节。阅兵主题是反恐。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黑豹突击队(Raid)、反恐特勤队(BRI)都是第一次受邀参加经由香榭丽舍大道的隆重阅兵式。

➤ 欧洲时报7月15日，奥朗德总统14日出席传统的国庆阅兵式，并发表国庆节电视讲话。讲话中他突出了他在希腊债务问题上促成欧盟达成协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强调他决心保护法国人民对抗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奥朗德还对欧盟建设提出了积极性的建议，他说：“为了遏止欧洲联盟内部接连出现的危机”，他将走得更远，他宣布“他将提出一些提议，以组成一个欧盟经济政府”。

➤ 欧洲时报网7月18日，墨西哥总统涅托12日至16日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是18年来首位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墨西哥总统。两国总统16日出席了60多份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对双边关系发展良好表示高兴。奥朗德表示，近两三年两国关系改善，双边贸易额每年增长10%，今年以来贸易额已经增长了30%。550多家法国企业在墨西哥开展业务，墨西哥企业也开始到法国发展。另据新华社报道，就在日前结束的7月14日法国国庆阅兵式上，墨西哥首次作为嘉宾国参加。约150名墨西哥军人也应邀首次参加了法国国庆阅兵式，并在阅兵式上走在最前面。

➤ 环球网7月23日，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22日报道，经两天的辩论审议，法国国民议会7月22日晚通过由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提出的新《移民法》草案，该法案改革了旅法外国人权益。据悉，法案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设立了有效期2到4年的多年居留证。还设立一条外国留学生转为工薪阶层的措施，即设立为期4年的“人才护照”，这对法国合法的非欧盟国家外国人而言，的确是一项福音，之前他们需要每年更换一次居留证。

英国

➤ 中新网7月8日,据外媒8日报道,7月7日是英国伦敦七七恐怖袭击10周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纪念活动上表示,尽管英国本土10年前发生血腥的七七恐怖袭击,以及30名英国人上个月在突尼斯度假时被恐怖分子杀害,但英国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倒。

➤ 中新网7月14日,据外媒报道,1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视察一皇家空军基地时发表谈话说,英国政府将确保在特种部队和军用无人机方面的投资,以加强打击“伊斯兰国”(IS)极端分子的能力。

➤ 欧洲时报网7月21日,英国首相卡梅伦20日发表演讲,宣布英国将推出打击极端主义的五年计划,以寻求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好战分子鼓吹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英国散播。整个五年计划方案预计将在秋季提交国会表决。卡梅伦表示,英国将致力于与美国合作,一定要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卡梅伦还警告年轻人“别当炮灰”。报道引述英国反激进主义的“基连姆基金会”领导人罗素的话称,英国总算出台了一个强有力的全面反恐战略,确立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晰的针对极端主义的战略方向。

➤ 中新社7月23日,英国培生集团(Pearson)23日宣布,该集团旗下的英国《金融时报》以8.44亿英镑(约13.1亿美元)的价格,被日本媒体公司日经新闻(Nikkei)收购。这也宣告培生集团对金融时报58年的所有权结束。《金融时报》创办于1888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财经媒体之一,由该报创立的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指数更是闻名全球。

➤ 欧洲时报网7月27日,近日,英国政府出台新规定,欧洲之外的移民若想进入英国,需要提供他们犯罪记录的详细信息,否则他们将被拒绝入境。中新网消息,从2015年9月开始,任何办理特定签证进入英国的人,都需要提供十年之内的居住国的犯罪记录证明。这项新规定旨在防止境外犯罪分子进入英国境内,将首先应用于“投资”及“企业家”签证申请人群,2016年起将扩展至其他签证。不过,这项检查将不适用欧盟成员,因为他们享有自由进入英国的权利。

➤ 环球网7月2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7月26日开启对东南亚四国(印尼、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为期4天的访问,旨在提升英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扩展出口市场。据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27日报道,此次陪同卡梅伦访问的有一个由31名英国商界领袖组成的商业代表团。而与此同时,英国商务大臣赛义德·贾维德也正领导另外一个代表团访问该地区。卡梅伦希望这次出访能增进英国与增幅迅猛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以便给日后英国产品和服务出口提供方便。此外,卡梅伦还将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商讨如何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等议题。

➤ 中新网7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27日开始访问法国,分别与法国总理瓦尔斯、外交部长法比尤斯、经济部长马克龙会面。他还将访问其他欧盟国家,探讨欧盟改革事宜。奥斯本日表示,在英国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之前,欧盟应该进行改革,这样有利于使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从而实现一个双赢的局面。奥斯本还表示,希望欧盟是为所有欧洲公民服务,支援欧洲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希望欧盟各国支持英国关于将欧洲建设成“有竞争力和活力的大陆”的倡议。

希腊

➤ 中新网7月8日,据外媒报道,希腊8日向欧洲稳定机制(ESM)申请为期3年的贷款计划,以此偿还当前债务。此前,欧盟已经给希腊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能在周末达成协议,希腊及其银行将在13日面临破产。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希腊将会尽快拿出新的

方案，最迟在周末前会提交欧盟讨论。但他强调，他希望看到达成一个“社会意义上公平、经济上可行”的协议。

➤ 中新网7月9日，据外媒报道，多名欧美经济学家在外媒发表联合署名的公开信，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改变解决希腊问题的思路，他们认为，应当允许希腊留在欧元区，允许重组和削减希腊债务，给希腊经济喘息的时间。

➤ 新华网7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8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发展融资演讲前就希腊问题发表了简短声明。她强调，IMF 不会给希腊特殊待遇，希腊必须进行债务重组以实现债务可持续。她提出，救助方案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幅推进改革，巩固财政基础；另一方面要推进债务重组以实现债务可持续。在希腊问题上，债务重组尤其关键。拉加德说，尽管希腊对 IMF 债务违约，希腊全民公投拒绝了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的协议草案，但 IMF 仍将帮助希腊找到稳定经济、重塑增长、实现债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 中新网7月10日，综合报道，希腊在9日晚间的最后期限之前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了新的方案，包括承诺进行养老金改革和增税等，以获得第三次金融救助。同时，希腊决定银行将继续关闭。

➤ 新华网7月11日，希腊经济界人士10日称，希腊从6月29日开始实施的银行停业和资本管制让商业活动陷于停顿，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12亿欧元。

➤ 新华网7月12日，据芬兰媒体11日报道，芬兰决策层已统一立场反对继续向希腊提供救助，并主张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

➤ 中新网7月12日，据外媒12日报道，意大利总理伦齐说：“现在是理性对待希腊危机的时候了，各方必须达成协议。意大利不希望看到希腊离开欧元区。我也想对德国说：够了。”伦齐认为希腊不可离开欧元区，并表示他将说服德国政府。

➤ 中新社7月12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7月12日向外界披露，取消原定于当晚举行的欧盟峰会，并于当天下午三点如期举行欧元区峰会，“孤注一掷”求解希腊危机的对策。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就希腊救助协议的分歧明显。以德国、芬兰、荷兰等国为首的“保守派”对雅典方面极为不信任。芬兰拒绝给予希腊资金援助；德国则要求希腊改进救助协议。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甚至提出了一份让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五年的计划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希腊政府的提案给予了肯定。法国总统奥朗德明确指出雅典方面提出的方案认真、可信，显示出了诚意，欧元集团应该在此基础上把希腊留在欧元区。意大利总理伦齐则希望德国方面停止对希腊的“羞辱”，尽快就协议达成一致。

➤ 中新网7月13日，据外媒报道，在经历了1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13日宣布，欧元区领导人就希腊援助协议达成一致，将对希腊提供新一轮援助，避免其脱离欧元区。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欧元区将为希腊偿还债务设立特别基金，希腊将用于私有化的资产将被转交给该基金。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对希腊的新一轮财政援助金额高达820亿至860亿欧元，援助期为3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达成协议后表示，讨论希腊脱离欧元区的问题已经过去，希望大多数希腊公民支持让国家重返经济发展道路的努力。他

还说，欧元区峰会上的协议磋商是“艰难的”，但希腊得以避免将国有财产转让给境外方面，也避免了金融扼杀和金融系统破坏。

➤ 中国日报网7月15日，综合外国媒体报道，希腊总理齐普拉斯7月14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就新近达成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向国民做说明。此前一天，欧元区领导人同希腊达成新的救助协议，要求希腊在税收和养老金改革等方面实施更为严厉的紧缩措施，并在15日午夜前通过相关立法，债权人则同意在希腊履行承诺后考虑向其提供820亿至86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齐普拉斯宣称他不赞成欧元区领导人提出的苛刻救助协议，但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国家他只能同意执行。他还表示，会做满四年任期，不会辞职。

➤ 中新社7月16日，希腊议会16日凌晨通过“改革换援助”一揽子法案，其中包括希腊政府13日与债权人达成的协议以及第一轮改革措施，从而为希腊获取第三轮救助贷款创造了条件。该系列法案中涉及到增税、养老金改革、国有资产私有化等严格的紧缩政策，遭到不少议员的强烈反对。新上任不久的希腊财政部副部长就表示自己不赞同新法案，并向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递交了辞呈。欧元区13日在希腊“脱欧”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允许希腊留在欧元区，三年还可获得最多860亿欧元救助资金，但必须继续实施削减退休金、上调消费税等财政紧缩措施，甚至还要减持或出售约500亿欧元国有资产，成立用于偿还债务的基金等。

➤ 欧洲时报7月21日，20日早上，希腊关闭三周的银行重新开业；众多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大幅上调；欧盟超过71亿欧元的紧急援助到手，但转手差不多都还了债。

➤ 中新网7月24日，综合消息，经5小时激辩，希腊国会23日表决通过第二轮改革方案，方案包括银行及司法制度改革，如设立存款保障制度及减低民事讼费等。加上希腊议会7月16日批准第一轮改革计划，议会已完成相关立法安排，为接受欧元区下一轮最多860亿欧元的救助铺平道路。齐普拉斯强调目前重点为援助谈判，让社会回复正常。

欧洲经济

➤ 中新网7月9日，据外媒9日报道，英国政府公布的新财政预算案将进一步削减开支，总额高达370亿英镑，其中包括120亿英镑的福利开支。这是自1996年以来第一份完全由保守党政府制定的预算案。

➤ 中新社7月14日，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委员会于13日至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会议。乌克兰政府称，双方会后表示，将于2016年在欧盟与乌克兰间建立起自由贸易机制。俄罗斯认为，这将给俄经济带来损失。

➤ 欧洲时报7月20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19日带领经济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成为签署核协议后首个到访德黑兰的西方国家政要，此行旨在发掘双方之间的贸易机会。许多德国企业都希望能够在这个石油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获得价值上百亿欧元的订单。德国曾经是伊朗最重要的供应商，不过2007年中国取代了德国的地位。制裁禁令限制了德国的出口。

➤ 中新网7月23日，据外媒23日报道，英国保守党政府财长奥斯本发起对政府预算的公共开支进行审核，计划削减200亿英镑。奥斯本表示，通过谨慎地管理公共开支，“我们能够用更少钱办更多的事情”。

➤ 环球时报7月24日,伊核协议达成后,欧洲迫不及待地想重返伊朗市场。继德国副总理和法国外长之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办公室23日宣布,莫盖里尼将于28日访问伊朗。同一天,奥地利宣布,总统菲舍尔将于9月访问伊朗,成为2004年以来首位访伊的欧洲国家首脑。在一些媒体看来,欧洲领导人接踵访伊,议题离不开经贸。

国际综合

伊核协议达成

中新网7月15日,7月14日,伊核问题六国、欧盟和伊朗在奥地利维也纳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使这场持续13年之久的国际争端最终得到了圆满的政治解决。这份协议共约100页,包括主体部分,另外还有五个附件,分别涉及制裁问题、核领域问题、六国与伊朗联委会的工作、核能合作以及协议执行计划,其内容涵盖了解决伊核问题涉及的所有关键领域。综合报道称,伊朗承诺永不寻求获取核武器,并称赞伊核协议是“历史性时刻”。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领袖纷纷为协议“点赞”。各方认为,全面协议的达成,开启了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新篇章”。

乌克兰问题

中新社7月24日,综合消息: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领导人23日晚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东部局势,就多个问题达成一致,呼吁全面实施新明斯克协议,为乌克兰东部冲突地区建立非军事区设定“时限”。

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峰会

新华网7月10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9日在俄罗斯南部城市乌法举行,峰会主题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峰会就金砖五国关心的广泛议题达成共识,通过了《乌法宣言》、行动计划、《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等纲领性文件,为金砖国家中长期合作指明了方向。其中,《乌法宣言》就联合国改革、维护二战成果、世界经济形势、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乌克兰局势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表达了共同立场,各国希望在航天、工业、能源、信息通讯技术等众多领域深化合作,体现了其在国际问题上的广泛共同利益。会议通过的《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成为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矿藏加工、能源、农业、科技、创新、财经等领域扩大合作的关键指南。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将要求有关部委采取切实行动落实这一战略并制定2020年前金砖国家经贸和投资合作路线图。围绕构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呼吁各成员国共同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治理的“四大伙伴关系”。他生动指出,金砖国家就像5根手指,伸开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只拳头。他强调,金砖国家合作不是清谈无为、海阔天空,而是讲求实效、抓铁有痕。他强调,金砖国家要继续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际关系中动辄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无助于解决问题。要倡导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和政治方式解决分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工作也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年内将全面运作并启动首批合作项目,为金砖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观察人士认为,本次会晤再次彰显金砖国家推动务实合作走深走实、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决心,峰会成果将为金砖国家合作带来强劲动力。

中新网7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10日在俄罗斯乌法举行,会议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声明》,其中特别对中国人民的英勇精神和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此外,会议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表示,元首们重申愿积极参加2015年9月在中国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团结互助 共迎挑战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跨越》的讲话,就如何在新起点上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新跨越提出5点主张。他强调,安全方面要尽早启动反极端主义公约起草工作,加快成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中心;经济方面要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各国发展战略及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中方愿通过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平台,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需求,将双边产能合作经验拓展到上合组织更大范围,在各成员国建立工业园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支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些倡议受到各方欢迎和积极响应。会议通过了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加入程序决议,接纳白俄罗斯为本组织观察员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为对话伙伴国。这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组织变革,有利于提升组织代表性和国际地位,将对组织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时报7月10日,乌法金砖国家峰会成果显著,新开发银行50个投资项目已选定。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该国乌法市举行的新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峰会上宣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明年起就可实施运营,开始投资具体建设项目。